

张爱玲 晚期写作研究

程小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爱玲 晚期写作研究

程小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程小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 - 7 - 5203 - 4019 - 9

I. ①张… II. ①程… III. ①张爱玲(1920 - 1995)—写作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187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吴书利
责任校对 王 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程小强兄的博士学位论文《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即将付梓，嘱我写几句话。这大约是因为我以前出版过《张爱玲传》《张爱玲十五讲》两部著作而引起小强兄注意的缘故。不过最近这些年，由于研究志趣日益转移到相对“偏僻”的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我对张爱玲的关注不免减少，对其“晚期写作”的研究现状就更缺少深入观察了，故而面对小强兄条理清晰而又裁断精准的新著，就不敢以年长者自居，而更多是作为读者与同道，谈几点新鲜的阅读感受。

历来学术研究，皆注重从基础文献入手，或从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或从旧材料“别有心裁”而另出“高明论断”。小强兄这本张爱玲研究新著，于这两层都有明显的收获。源出萨义德的“晚期写作”概念，近年在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激活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有关沈从文、孙犁、周作人、茅盾等文学大家的“晚年写作”，已颇见专门之研究（如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这些研究，不但深化了有关作家个体的精神世界与叙事世界的研究，也往往从不同



侧面挑战、重构并丰富了现有的文学史叙述格局。比较而言，目前学界对于张爱玲“晚期写作”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埃斯卡皮说，人们对于作家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三四十岁时的样子，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一现象尤为突出。目前读书界心目中的“张爱玲”形象主要是由她二十二三岁时（1942—1944）两部薄薄的集子（《传奇》《流言》）建构的。但以创作数量论，目前可见的张爱玲“晚期写作”其实已大幅超过其“少作”。更重要的是，张爱玲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只有经由晚期文学的研究方能澄清，如《金锁记》是否代表张爱玲写作的“主流”、主体经验介入的成败得失等，倘若缺乏前后“对照”是颇难辨析清楚的。然而迄今为止，尚无学者就张爱玲“晚期写作”予以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我自己撰写《张爱玲十五讲》一书时，虽然也涉及《小团圆》等“晚期写作”，但主要兴趣还是集中在她1955年赴美之前的作品之上，对她后来辗转美国、中国香港之间的诸多剧本则缺乏关注。

这部新著正好弥补了目前张爱玲研究的缺失，其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张爱玲“晚期写作”发生在她移居美国之后，其时她不仅个人生活步入“哀乐中年”之境，写作环境也从上海时期的“左”“右”互搏变换为异域写作的文化冲突/隔膜。虽然欧美（主要是欧洲）一度是张爱玲的向往之地，但那多少是“想象的异邦”，一旦真的身临其地，跨语境叙事的压力可想而知。这种变化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迄今尚未在研究中得到必要呈现。因此，小强兄新著的出现是敏锐而及时的，对于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乃至现代文学史研究皆有补足“短板”的意义。这部书稿，由张爱玲而涉及的重要文学史问题颇为纷繁，如死亡、爱欲、绝望、虚无、国家主义，



等等。对这些深浅不一的文学/哲学问题，小强兄都予以了体系化、反思性的解读。其中尤令我注意的，是他提出的“妥协主义”概念。以前章学诚论学，言天下学问，莫不出于“沉潜考索”“高明独断”两途，而“妥协主义”一说，大略近于后者。这是小强兄从张爱玲自己的论说中提炼出来的。在与友人宋淇的通信中，张爱玲说：“人生本是 compromise [妥协]，有许多时候反而因祸得福”“美国人总说要 really live [实在地活]，就是做自己爱做的事。尤其在动荡的乱世，更应该享受”。这一概念，抓住了张爱玲人生与写作中的核心秘密，颇可以用以理解张爱玲之于普通人现实安稳的喜悦。而我自己一直用以阐释张爱玲的“虚无主义+物质主义”的叙事哲学也可以从“妥协主义”找到根据。而由此，更可以找到与晚期张爱玲“对话”的通道。小强兄认为，1956年之后的张爱玲，其文学关键词就是回忆，追忆往昔，“重新创造失去的时间”。这亦是精当之见。实则“妥协主义”在张爱玲写作中是贯穿始终的。妥协主义者，“妥协”于现实，无论这现实是个人受挫还是政治专制。他们无意于改革，疏远于不甘屈服的反抗，而着眼于眼前温暖可触的一切。自然地，随着青春的流逝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家”的丧失，承载着曾经“透亮”的生活过的记忆，就成会成为张爱玲写作的主要用力之处。她早期的《金锁记》《倾城之恋》已有这种“回忆的诗学”的倾向，晚期写作系念于此就更是势所必至了。

亦因有“哀乐中年”的万般体验为底，晚期张爱玲甚至多了一些青年时代还不曾有的单纯与深沉。这部新著援引的张爱玲《易经》中的一段话，同样令我感慨系之。这里有青年时代张爱玲不曾陈述过的爱之体验与人生嗟叹：“她觉得过了童年就没有这样平安过。时



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这一段时间与生命里无论什么别的事都不一样，因此与任何别的事都不相干。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对此，小强兄略有批评之意，将之命名为“隔世感”：“人生就如一出古戏，从过去到未来，永远唱着，永远的死寂，永远的局外人；人生也如一场梦，梦醒了却不知今世今时何地何年何月；人生就是那些走完了残台破阶之后的终极无路。”不能不说，这是敏锐的判断。不过在人到中年的我读起来，仍然是“心有戚戚焉”。

这些精当贴切的见解与阐发，无疑是建立在小强兄对研究对象“同情之了解”的基础上的。不过，就“贴合”而论，在张爱玲研究中还不能完全构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实在而论，在当今的中产阶级文化中，张爱玲不仅是一个文学史上业已完成“经典”建构的作家，而更是一个被消费的文化偶像。然而在消费潮流之下，小强兄并未泥陷其中，相反，他的独立不羁的研究个性如此鲜明地不苟同于时代。这在两点上给我深刻的印象：一是他对张爱玲投降主义的剖析与批评。他认为，妥协主义者若生逢乱世，譬如异族入侵，是很容易沦为投降主义者的，如北平沦陷后的周作人，如港战时期的张爱玲。在他看来，这种社会态度上的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也影响到了张爱玲的文学书写，譬如当“失去责任的底线”时，“好多滑至边缘的软性人生——人性样式就被不负责任地推出，如《色，戒》大抒汉奸作为普通人的人性之弱与人性之常”“（张爱玲）缺失的正是人性应有的基本底线和对责任意识的维护，即文学应该召唤一种健全、优美、自在的人性，具备严正的担当意识，即使叙写人



性之恶，起码也应具备基本的批判性视野。这点也正是张爱玲文学叙事的根本缺失。”二是对张爱玲晚期写作的整体价值的判断。他认为，“张爱玲晚期文学最大的功用在于解决了其一生文学叙事的发生学问题，晚期文学成为其一生人与文的最重要注本”“这是张氏晚期文学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意味着，张爱玲晚期文学的独立性不足，创新度不够”。这种判断多少会引起同行之于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价值的怀疑，但小强兄唯以客观、冷静的判断为追求，这多少体现了青年学者不多见的“不阿世、不趋众”的批评原则。刘勰所谓“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大约亦如是矣。

这部张爱玲晚期写作研究，只是小强兄的博士学位论文。据我所知，他的研究还涉及“十七年文学”研究和路遥研究。我与他的结识，也因为在研究领域和趣味上的多重相近。记得是在去韶山毛泽东旧居的途中，他给我推荐过从维熙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并大力称赞从维熙的“见证式”叙述及思考。这是偶然的相逢，日后又因为其他事情而有了不少交集，我深深感受到了他埋藏于心的有关历史的澎湃热情，以及精细沉静的学术气质。两种不无矛盾的性格特征，兼具于一人，令人称奇、称赞。这无疑是他走向更宽阔的学术道路的保证。

是为序。

张 均

2018年3月30日于广州

导 言

对张爱玲的研究，发轫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的上海，傅雷、周瘦鹃、柳存仁、苏青、胡兰成、吴小如等人是最早的研究者^①。这些研究文章大都集中于印象批评，一边倒叫好的居多，缺乏学理层面上的梳理。其中，迅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最具代表，肯定和否定都颇具批评意识。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经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王德威、周蕾等几代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和推介，首先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台港学术界和创作界掀起了张爱玲研究热潮。这一热潮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传进大陆，唐弢、柯灵、杨义、陈子善、吴福辉、陈思和、孟悦、戴锦华、林幸谦、解志熙、李今、张均、范智红、刘川鄂等学者都做出了不同的推进。近年来，得益于张爱玲全集的陆续编辑出版，张爱玲研究中的基础资料大致完备，但相应的研究视野多停留在“都会传奇”“双城记”“苍凉”

^① 相应的研究论文见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 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



风格、“民国才女”“格局不大”“不如鲁迅”等感觉层面，否定者和肯定者的水准都有待大幅提升，也有部分学者从“人的文学”“世俗文学”和现代民族国家诉求等层面出发指出张爱玲为人与为文的得失。当前大陆的“张爱玲研究”，面临着三个难题：一是如何辩证地看待并吸纳海外和港台学者60余年来已有的高水准研究成果。二是如何看待张爱玲的文学叙事和中国新文学传统面相之合与精神实质之离的问题，尤其是自1985年以来的“后革命”语境下，文学性、审美性、自由性的文学评价标准暨文学环境被一再营造、鼓吹、确立之后，应该拿什么样的评判标准对张爱玲的创作加以定位及做出相应反思性批评研究，尤其是在张爱玲不断被神化并被当作新的文学传统之后，亟待相应的批判性视野与方法论介入。三是有关张爱玲1955年之后的文学创作研究的基本问题无法厘清，如对其晚期文学的研究能否延续当前研究界对张氏20世纪40年代沦陷时期文学研究的话语模式，如何解析和定位《雷峰塔》《易经》《小团圆》等张氏晚期文学的自叙传内容及重复叙事，如何理解张爱玲与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的渊源，张爱玲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影响研究”如何展开，等等。

夏志清于1957年在台湾的《文学杂志》发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两篇评论，该文收入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该著张爱玲专章的主体。他首次在文学史中以专章规模讨论了张爱玲的生平及创作，并使张爱玲超过鲁迅成为占据篇幅最大的作家。夏志清的张爱玲研究，涉及张爱玲1950年代之前所有的重要作品，从《金锁记》《倾城之恋》到《秧歌》和《赤地之恋》。他将张爱玲提到与鲁迅比肩的位置，更以世界性的文学眼光，



认为张爱玲与英美文学界一些著名女作家相比也不逊色，有些地方甚至高一筹。他将新批评学派文本细读的微观分析眼力与宏观判断的眼界结合，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新文学批评家的感受/印象式评析法想通，以文学性、审美性为评价起点，肯定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在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心理分析的深刻上取得的长足进展，并极度肯定了张爱玲对普通人生命和现世生存欲望的抒叙。夏志清的张爱玲研究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所熟知，其研究成果被频繁引述。夏志清的研究可看作对傅雷1940年之于张爱玲评价的反驳与回应，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鲁郭茅巴老曹”的既定格局，唤起了人们重写文学史的冲动。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开始“浮出历史地表”，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突破的标志性作家。

刘再复对夏志清的批评自有道理^①。他肯定夏志清对张爱玲文学主旨及叙事风格的基本判断，同时提醒要从“鲁迅神话”的制造中吸取教训，避免再造一个“张爱玲神话”。他不同意夏志清用“忠实而深厚的历史家”和“强调优秀与丑恶对比”的道德感，来概括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沦陷时期中短篇小说的精神内涵。刘再复发现，张爱玲沦陷时期创作的价值，恰恰在于对历史和道德的超越。他借王国维的观点^②，认为在中国文学的两大类型，即《桃花扇》型（政治、国民、历史）和《红楼梦》型（哲学、宇宙、文学）之中；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传统，超越了“政治、国民和历史”，

① 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② 王国维的观点见其名作《〈红楼梦〉评论》第三节。



而显示出“哲学、宇宙、文学”的特点，还有“超越空间之界（上海、香港）和超越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但刘再复最终也落入了“排座次”的思维中，纠缠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的高下取舍上。刘再复认为，张氏 20 世纪 40 年代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的成功在于其“超越性”，50 年代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张爱玲没有将“超越性”贯彻到底。刘再复的认识揭示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既作为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原点也是张爱玲最具水准的作品的文学史实，但在对张爱玲文学特质的理解上颇有局限。张爱玲的文学叙事成功在于其对以殖民时期上海为代表的中国社会最后的高门巨族群体没落史和都市底层弱者们做出了精神上的共鸣，并执迷于同情的理解与感同身受的体贴，“超越性”的提法事实上站不住脚。实际情形是，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家国叙事之外，偏至而深情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虚无主义文学—哲学传统，并将其置于现代家国离乱之背景下进而给予富有时代感的阐发。刘再复的这一认识为后来研究留下了可待开拓且必须进一步反思的空间，尤其是张爱玲的晚期文学对以《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为代表的“人的文学”和“俗世文学”的继承、开拓、推进、偏至乃至局限之处就颇值得考察。

在对张爱玲作为“上海摩登”的文学构建者之一的现代性内涵发掘中，李欧梵的“张爱玲研究”系列论文新见迭出，并结集为《苍凉与世故》^①一书，其中包括《张爱玲：沦陷都市的传奇》（作为新世纪之交的畅销书《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① 李欧梵：《苍凉与世故》，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1930—1945》的一章)和《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和“现时感”》这两篇名文。他的研究是从夏志清所说的“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入手,将“现代性”观念引入“张爱玲研究”。他用“现时感”(现代时间哲学视角)替换了“历史感”(传统历史哲学视角),避开了传统诗学对现代作家的苛求;用“现代都市空间”分析取代了传统文论中的“环境”研究,使“现代感性”问题得以凸显。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物(商品)、景观(现代都市)、时间(命运)引出的荒凉感、破碎感、不安全感,成为李欧梵解读张爱玲的关键词。李欧梵还从各个不同角度(建筑、照片、电影、时装等现代器物)将张爱玲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广度和高度,将张爱玲及其文学叙事置于中国现代总体文化意象(时空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等)演变的逻辑中。

王德威的张爱玲研究^①,是继夏志清和李欧梵之后的又一“张学”标志性研究成果。他试图将张爱玲的创作,放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性”潮流之中加以考察。王德威指出:张爱玲将20世纪40年代《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改编为60年代《怨女》中的银娣形象,其实质是“张爱玲花了近20年的时间试图定义这一(感情)空间,终把七巧所内蕴的悲剧潜能化为银娣所代表的荒凉境遇”。而王德威借助于吉尔·德勒兹区分两种文学再现的方式,认为“大部分读者对张爱玲在摹拟写实方面的造诣,也就是德勒兹所谓的第一种再现方法,都能欣赏。我独认为张爱

^①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玲与众不同处，在于她发掘了第二种的虚拟写实的世界。她告诉我们，我们居之不疑、信以为真的世界其实早已是幻象罗列，任何写真还原的作为总是产生一连串买空卖空的文字交易。她嗜写鬼气森森的人物，似乎提醒我们生命其实是阴阳虚实难分。更重要的，张的风格总透露对‘不能或忘的’或‘难以再现’的事物，一种徒然的追求。很吊诡的，这使她对现实景物的爱恋依偎，反而更变本加厉”“德勒兹区分‘再现’的方法有二：一种视现实为圣像，务求再显灵光；另一种视现实为海市蜃楼，将其作幻影般呈现。张爱玲的与众不同处，就在于穿梭于此二者之间，出实入虚，终以最写实的文字，状写真实本身的运作与权宜”。另外，王德威化用叙事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西学理论资源，对张爱玲作品的结构和精神谱系进行了极具开拓的解剖。王德威认为，从《金锁记》到《怨女》，同一个故事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进行了四次改写，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看，是对“始原创伤”的治疗和救赎；从叙事学角度看，是对现实的不确定性的着迷，是对“现实”进行多元再现的冲动。对张爱玲的文学叙事与中国新文学主流叙事之间的离合问题，王德威这样总结：“相对于家国想象，她看到女性无家弃国的孤绝；相对于人性至上的口号，她点明女性不能化约为人性。相对于革命的憧憬，她写出革命‘内卷’轮回化的可能。最后，相对于铸在香炉上，预备流传百世的铁画银钩，张的叙事化金玉之声为似水流言”“张爱玲一脉的写作绝少大志。以‘流言’代替‘呐喊’，重复代替创新，回旋代替革命，因而形成一种迥然不同的叙事学。”王德威更指出张氏文学的虚无主义、妥协主义本质及表现形式：“张是写实主义的高手，生



活中的点滴细节，手到擒来，无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但这种对物质世界的依偎爱恋，其实建筑在相当虚无的生命反思上。她追逐人情世路的琐碎细节，因为她知道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恃。‘时代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处在历史的夹缝中，能抓住点什么，管它庸俗零碎，总就对付过了下去。”也就是“失去了进步革命的精气神，张自我沉溺在狭小的上海滩头，与她的角色一起‘向下沉沦’”。王德威的研究尤以文本细读功力见长，能客观地看待张氏文学的精神内旨及虚无主义实质，对张氏文学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离合问题做出了极具启示的阐释，这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界及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均不多见。

张爱玲研究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看待张爱玲的文学叙事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主流叙事之间的面相之合与精神实质之离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标准评价张爱玲的创作，尤其如何界定张爱玲的文学叙事同五四新文学的关系。1985年，著名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指出：

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



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①

的确，无论是“革命文学”还是“文学革命”“工农兵文学”还是“救亡文学”，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还是国民性批判，这些似乎已然定格的文学史话语模式都与张爱玲的文学叙事格格不入，所以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写出来的文学史中，没有她的位置。刘再复笼统地将原因归之于张爱玲的“超越性”。黄子平与刘再复的观点近似，他认为鲁迅和张爱玲都具有“超时间”特征，但鲁迅比张爱玲更幸运，被稳妥地安放在现代文学史的开端。他指出：

我们谈张爱玲的时候……一定要讲到鲁迅。其实鲁迅也是鬼气森森的……他的狂人的那些疯狂的意象，跟张爱玲一样也是黑色的、绝望的……两个“神话”，或者“鬼话”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好像比较好办，大家一下子就把他摆在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开端的好处就是它是所有后来者的源头，他永远占据了那个先驱的位置，所以“开端”不仅仅是“开端”，“开端”是“超时间”的。那张爱玲呢？……我们如果能把她提升到超时间的高度，就不用担心把她往哪里放的问题了。^②

在黄子平看来，历史或文学史的建构者是那些真正主宰时代的话语者，或者看谁的话语生产更具吸引力。客观地看，鲁迅和张爱玲的文学意义恰在于现世性和现时性，并不在于超越性，在超越性

① 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年第4期。

② 黄子平：《讲评》，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之下又制造一个“超时间”的概念并不有助于推进当前的张爱玲研究，或有故弄玄虚和人为制造热点之嫌。其实，这不仅是黄子平一个人的看法，在张爱玲研究界，超越性就像一把万能钥匙，在在言之凿凿、故作高深，其实就是将自然人性之常、乱世人性之弱、末世人性之虚无上升至一定的想象高度，甚至将其哲学化、抽象化。如高全之认为：“沈从文与鲁迅小说里固然有张爱玲未能企及的种种生活经验，然而在近代中国战乱里从事超越党争、持平自然的人性记述，没有其他中国作家能够凌驾张爱玲之上。”^①

与这类正名焦虑或深刻发掘相类似的，王德威称张爱玲为“张派写作”的“祖师奶奶”，要将张爱玲视为一个新的“开端”。王德威认为，作为“海派传统”的名门正派，张爱玲的写作上承《红楼梦》《海上花》和“鸳鸯蝴蝶派”，下启白先勇、施淑青、朱天文、李碧华、王安忆等，以现代大都市（上海、香港、南京、台北）为背景，状写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形成了一种“张派”风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传统”之外的另一重要流派。但是这一“开端”的确定，无论从学术逻辑还是从读者的接受心理，都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多显刻板概念化之嫌，仅仅可看作为论述分析上的便利化策略，如王安忆并不认可这种定位，她说：“我可能永远不能写得像她这么美，但我的世界比她大。”此语当然暗含否定和讥讽。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张爱玲的文学位置恰在于其对《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古典主情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并将虚无主义人生－哲学的理解和现代乱世

^① 高全之：《张爱玲学》（增订二版），台湾麦田出版2011年版，第378页。